

《四字经》^①在中日两国的流传与变迁

杨 洋

2007年业师陈正宏先生在安徽乡间访得《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二种,一为乾隆四十年(1775)刻本,一为清末民国间刻本,各一册。二书内容基本一致,乾隆刻本的内封题“明会元萧良有著”。此书在国内很少见,经本人研究,脍炙人口的蒙学书《龙文鞭影》即据之增订而来。而在日本,江户时代曾多次翻刻《四字经》,现在日本还有相当数量的刻本存世,一些刻本的年代甚至早于乾隆四十年。

《四字经》似乎不太为人注意,中日两国都未见相关论著。《龙文鞭影》流传广泛,现代有多种整理本出版,有学者对其版本源流做过一些探讨。如上海古籍出版社版《龙文鞭影》的整理者李祚唐在《校点说明》中说:“《龙文鞭影》是以介绍人物掌故为主要内容的古代韵语训蒙读本,原名《蒙养故事》,明萧良有著,夏广文为之作注。后经杨臣诤大事增订,更以今名。清末又经李恩绶校补。另有清人李晖吉、徐澂续辑《二集》。目前常见的《龙文鞭影》通行本,即为李恩绶校补的《初集》(四卷)与李晖吉、徐澂续辑的《二集》(上下卷)合刊之本。”^②张志公说:“清代中叶以后盛行的《龙文鞭影》,现存种种通行本。这本书原名《蒙养故事》,明萧良有著,夏广文注。随后杨臣诤认为萧作太简略,夏注有错误,于是大加补充订正,改名《龙文鞭影》。清末的李恩绶又校补过一次。”^③李、张二位都认为《龙文鞭影》的原名是《蒙养故事》,大概是承袭前人说法,而没有看到《龙文鞭影》据以增订的原书。

以下拟对本人经眼的中日两国的《四字经》和《龙文鞭影》的版本源流和文本变迁进行讨论,进而说明同源的二书,在两国流传的过程中出现的不同特点和由此反映的两国近世教育的差异。

①现存《四字经》流传有多种版本,本文所涉及有题作《四字经》、《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和《新编旁训故事四字经》。文中在不涉及具体版本时,将此书统称为《四字经》。

②萧良有著,李祚唐校点:《龙文鞭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③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初探:附蒙学书目稿》,上海教育出版社,1962年,第60页。

一、中日两国的《四字经》

中日两国现存的《四字经》内容和版式都非常接近,应当来源于同一祖本。此书将上古至宋代的名人故事,用四言句的形式写出。全书共四言句 284 句,依韵排列。在此先引开篇八句,以示本书的内容、体例:“粗删四字(中国刻本作“四字”,和刻本作“故事”),海尔童蒙。经书暇日,子史须通。重华大孝,武穆精忠。尧眉八彩,舜目重瞳。”此外,此书存世的大部分版本都附有旁训,对正文进行简单注释。如“重华大孝”的旁训:“虞舜有重华之德,父顽、母嚚、弟傲,能尽其大孝。”

笔者目验的《四字经》,有中国刻本二种,和刻本二种,其中有三种明确题萧良有撰。萧良有的生平,见明代过庭训纂《本朝分省人物考》:“萧良有,号汉冲,汉阳人,弱冠举湖广乡试。庚辰会试一名,一甲二名,授翰林院编修,丁忧。甲申复除原职。丁亥升修撰。戊子主考浙江,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国子监司业事。壬辰升洗马,充日讲官,主考乡试顺天。乙未升国子监祭酒,本年准回籍。己亥致仕,卒。”^①又明代王兆云辑《皇明词林人物考》曰:“公名良有,字以占,楚之汉阳人。嘉靖甲子以《易》举于乡,年十四,犹然丕角童也。庚辰以《春秋》冠礼闈多士,一时传其制义,以为不愧唐、瞿诸先辈云”^②。由此可知,萧良有为明嘉靖至万历间人(1551-1599),十四岁中举,三十岁进士及第,后来历任官职大都和教育有关。他编纂的蒙学教科书应具相当分量的实践经验,且具实际推广的作用和可能。

萧良有撰《四字经》,明清书目中未见。现代藏书目录中,惟国家图书馆“联机公共目录查询系统”中检索到萧良有撰《萧太史训蒙故事四字经》抄本一册。以下先对正宏师访得的二种《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的版本进行介绍。

1.《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不分卷,一册。明萧良有撰,清乾隆四十年(1775)五车楼刻本。卷首上栏题“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下栏题“五车楼梓行”。有黄色内封,内刻一匡,匡上横题“乾隆乙未新刻”,匡内三行,题“明会元萧良有先生著/训蒙故事四/字经 五车楼梓”。正文第一叶右半叶版匡高 19.6 厘米,宽 11.5 厘米。版式为上下两截版,中有双行栏线隔开。每半叶大字三行,每行大字右侧有小字注文两行。上下两截每行大字各四字,小字各十六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字体为手写特徵很重的楷体字。

2.《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不分卷,一册。清徽郡黄富文堂刻本。卷首上栏题“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下栏题“徽郡黄富文堂梓”。正文第一叶右半叶版

①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七六,《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明天启间刻本。

②王兆云辑:《皇明词林人物考》卷十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明万历年刻本。

匡高 15.3 厘米,宽 10.6 厘米。行款与前一种基本相同,惟小字每行十三至十六字不等。白口,单鱼尾,四周双边。字体为较生硬的仿宋体,机器纸印刷。此书无明确刻印时间,但据字体、纸张估计,当为清末或民国刻本。

以上两种《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除开本、版匡大小不同外,版式、内容基本完全相同,可定为同一版本系统。

日本翻刻《四字经》的情况,据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著录:“四字经 明萧良有撰 朝川鼎(善庵)校 文化四刊(学古塾) 返送 大一”,“同 同(后印 冈田屋嘉七等) 大一”^①。另外,根据“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全国漢籍データベース)的检索结果可知,日本现在收藏的和刻本《四字经》有:《新编故事旁训四字经》一卷,日本正德五年(1715)京都中野五郎左卫门刻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关西大学图书馆藏;《新编故事旁训四字经》一卷,元文二年(1737)大阪桑原藤藏、村上伊兵卫刻本,东北大学图书馆、茨城大学图书馆藏;《新编故事旁训四字经》一卷,宝历二年(1752)刻本,实践女子大学图书馆藏;《四字经》一卷,文化四年(1807)学古塾刻本,东京大学总合图书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等 8 处藏^②。另据浙江工商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研究院王宝平先生告知,北海道教育大学图书馆还藏有《四字经注补》二册,为岩本改宜补注,谷口一学阅,东京醒醉堂明治十二年(1879)刊。

笔者目验的和刻本《四字经》有以下两种:

1.《新编故事旁训四字经》不分卷,一函一册,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明萧良有撰,元文二年(1737)村上伊兵卫、桑原藤藏刻本。卷首有《叙四字经》,署“伊藤长胤撰”。按,伊藤长胤(1670-1736),字源藏(元藏),号东涯、慥慥斋。江户时代“古学派”著名汉学者,精于考证,在儒学史、中国语学、制度史等方面多有著作传世。卷首上栏题“新编故事旁训/四字经”,下栏题“汉冲 萧良有著”。正文第一叶右半叶版匡高 20.1 厘米,宽 12.4 厘米。版式、行款与乾隆四十年刻本完全相同。白口,无鱼尾,四周单边。卷末有“题四字经后”,署“平安埴铃愚翁书”。书中在汉字正文的左右两侧,刻有日文的训读符号,有“返点”(用以表示用日语读汉文时文字的顺序)和“送假名”(用以表示用日语读汉文时添加的活用语尾和助词、助动词)两种。全书最末叶刻有刊记:“元文二丁巳岁初冬日/浪华书铺 村上伊兵卫 桑原藤 藏 求版。”此书虽未经“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著录,但从刊刻信息来看,应当与东北大学和茨城大学所藏元文二年刻本同版。

2.《四字经》不分卷,一函一册,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明萧良有撰,日本文化四年(1807)江户西宫弥兵卫刻、冈田屋嘉七等书肆后印本。内封文字三行:“善庵先生校阅/四字经/江户书林 西宫弥兵卫板。”卷首题“四字经/

①长泽规矩也:《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增补补正版)》,汲古书院,2006年,第59页。

②<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query=%E5%9B%9B%E5%AD%97%E7%B5%8C>。

汉冲 萧良有著”。正文第一叶右半叶版匡高 21.1 厘米,宽 13.7 厘米。版式为上下两截版,中间用双行栏线隔开。每半叶三行,无小字注文。每行上下两截各四字。白口,单鱼尾,四周单边。版心上部刻“四字经”,下部刻“学古塾藏”。卷末有跋,署“文化丁卯五月 大窪晔识”。跋后有半叶版权页,上部刻一个大正方匡,下部刻文字五行:“每部跋尾印以‘学古塾藏板’之五字而为记号,无是者皆属贗本。”但方匡中并无印记,大概因为该本是学古塾藏版的后印本,版权归属已经改变,故此叶照印而不盖印章。此叶后有四叶,用相对较小的字重刻了一遍《四字经》正文,每半叶九行,行十六字。最后有版权页一叶,刻:“京都三条通升屋町 出云寺文次郎、同 寺町通松原下ル 胜村治右卫门、大阪心斋桥通北久太郎町 河内屋喜兵卫、同 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卫门、江户日本桥通壹丁目 须原屋茂兵卫、同 本町通横山町壹丁目 出云寺万次郎、同 芝神明前 冈田屋嘉七”,为日本江户时代三大城市七个书肆的名字。

综上,现存最早的《四字经》版本是日本正德五年(1715)京都中野五郎左卫门刻本,由于条件限制,尚未得见。本人所见元文二年(1737)年的和刻本,也早于乾隆四十年(1775)的中国刻本。元文二年版与乾隆四十年版的《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内容、版式几乎完全相同,仅元文本开本、版匡比乾隆本稍大。二书字体也非常相似,都是手写特徵很重的软体字,但和刻本的笔锋较为外露。甚至于一些俗体字的写法,二书也完全相同。由此可知,这两种版本同源。

而文化四年(1807)的刻本,则在内容、版式和字体上都有所调整。此书只有四言句,没有旁训;字体则为比较标准的楷书,几乎没有俗体字。但此本的版式以及大字正文的内容,与本文述及的其他版本并无差别,因此还是属于同一版本系统。此本内封题“善庵先生校阅”,版心及卷末皆称学古塾藏板。按:善庵、学古塾皆为日本江户时代后期著名汉学者朝川鼎(1781-1849)的号。可能朝川鼎对此书的“校”主要体现在改正俗体字和删去旁注两个方面。另外,此书还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和元文刻本相同,此书的正文中刻有“返点”和“送假名”。但是,如上所及,在学古塾版权页和后印书肆的版权页之间,有四叶和前面大字正文完全相同的用小字刻的书叶,这四叶中正文旁边不仅刻有“返点”和“送假名”,还对所有文字标以“振假名”,用以表示汉字的日语读音,这显然是为日本的儿童识记汉字读音而准备的,而且,此书前面的大字正文中,汉字的旁边时有手写的“振假名”。所以本人推测,这四叶与前面内容完全相同的小字,类似于现在教科书的“参考答案”,说明此书在江户时代后期实际接受的过程中,既充当了基本的历史训蒙读物,又兼具了识字课本的功能。

二、从《四字经》到《龙文鞭影》

如上文所引李祚唐、张志公二位所言,《龙文鞭影》是杨臣诤在萧良有原书基础上大事增订的产物,清末的李恩绶又修订过一次。以后还有人续写了二

集、三集。《龙文鞭影》存世版本极其繁多,仅国家图书馆就藏有清代至民国的刻本、活字本及石印本四十余种,其中最早的是清代咸丰九年(1859)刻本。本人目验版本较为有限,有上海图书馆收藏的三种刻本,其中包括了杨臣诤增订和李恩绶修订两个系统的本子,大致可以明了此书的变迁过程。一为清光绪三年(1877)扫叶山房刻本(下文称“丁丑本”)。据内封所题,该本是杨臣诤增订本。第二种为清光绪十三年扫叶山房刻本(下文称“丁亥本”)。第三种为清光绪二十二年李光明状元阁刻本(下文称“光明阁本”),为李恩绶修订本。

丁亥本和状元阁本在内容、版式上基本相同,惟状元阁本没有《二集》,前集比丁亥本各多三十二条“新增”的内容。二本在版式上和源于康熙本的丁丑本有很大不同。这两个版本避讳非常严格,正文、注文中几乎没有遗漏,一直避至光绪皇帝“载湉”。二本都有李恩绶的序和跋,都属于李恩绶修订本系统。李恩绶的生平,尚未发现相关文献记载。

根据《龙文鞭影》的序跋,可知其成立经过。由于丁丑本没有序文,故移录丁亥本所载杨臣诤原叙:

《蒙养故事》,明中楚萧汉冲先生为加惠幼学而作,取古事之相类者,摘而成偶,又各谐之以韵。聪慧者日可数十事,迟钝者亦日可数事,不似声杂无伦者之难可强记也。为父为师欲其逸而功倍,此乌可以废焉!惜其徵事过少,而夏广文注又多舛谬疏略,是亦不可以已乎。岁丙申授经沙堤,偶有暇晷,因取次一为更定,复益以安平李瀚《蒙求对偶》,及江右俞文彬《续集》。然亦嫌徵事多无味,而注更疏舛,其可存才千百之一耳。庚子春,息影城西,朝来爽气恒惬心情,缘取曩书复为增订,迄秋尽而告竣,遂不止倍差于前。

由此可知,杨臣诤曾于顺治十三年(1656)和十七年两次进行增订。而此序中称萧良有书为“蒙养故事”,大概就是前述李祚唐、张志公二位说法的来源。另外,丁丑本的内封上题有“萧汉冲先生养蒙故事”和“训蒙四字经扫叶山房藏板”,据此也很难判断二者的关系。不过,现在中日两国尚有多种《四字经》实物存世,而且本人目验的版本中没有一种出现“蒙养故事”之名,似乎萧良有原书题作《四字经》的可能性比较大,而“蒙养故事”则是解释性的名词,如乾隆本《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的内封所题“训蒙故事四字经”之例。而李恩绶本的成书时间,则可据丁亥本跋知之:

甲申夏,为周葭陵中翰聘往庐西,中翰适见此稿,谓简而明,详而核,不独扩童蒙之闻见,且便于句读师之讲授也……余复领行箝所携之书及中翰插架之所有,按条目一一疏证之。

故李恩绶的修订始于光绪十年(1884),而跋署乙酉(1885)年,是故必完成于此之前。

现在我们可以断定《龙文鞭影》是在《四字经》基础上增订,其重要原因是《龙文鞭影》包含了《四字经》的绝大部分内容。若将乾隆本《新刻旁训故事

《四字经》与各本《龙文鞭影》进行比对,可以知道乾隆本《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共 281 条四言句(末缺一叶,实际全书当为 284 条),丁丑本《龙文鞭影》共 1034 条,丁亥本亦 1034 条,状元阁本 1066 条。三种《龙文鞭影》的正文部分基本相同。《龙文鞭影》中,有 204 条四言句与《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完全相同;6 条意思不变,仅调整语句结构,如《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中“唐门五豸,荀氏八龙”,在《龙文鞭影》中变成了“八龙荀氏,五豸唐门”;5 条更改人名,如《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中“杜康造酒,传说调羹”,在《龙文鞭影》中改为“仪狄造酒,德裕调羹”。可见,《龙文鞭影》继承了《四字经》的绝大部分内容,但新增的部分差不多是原书的 3 倍。如果再加上扫叶山房刊刻的《二集》,那么就有接近原书 8、9 倍的分量。

除了增入大量掌故外,《龙文鞭影》对《四字经》的注释有较大的改动。以下举“孙敬悬梁”一条说明:

《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

孙敬闭户读书,不睡,且以绳悬髻于梁,人皆曰闭户先生。

丁丑本《龙文鞭影》下卷:

汉孙敬,性嗜学,穷年闭户读书。或间一入市,人皆曰:“闭户先生来也。”每夜读,恐不堪睡,乃以绳悬其髻于梁上,少睡,则发顿而醒。

丁亥本、状元阁本《龙文鞭影》卷三:

汉孙敬,字文宝,信都人,性嗜学,穷年闭户读书。或间一入市,人皆曰:“闭户先生来也。”每夜读,恐其久睡,乃以绳悬其髻于梁上,少睡,则发顿而醒,仍读之。○又刘孝标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至旦,时或昏睡,热其须发,及觉复读。

可以看出,《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的注文非常简略,杨臣净增订后的《龙文鞭影》则对人物的身份、时代、相关掌故等有详细的解释和发挥,有时还有注音。另外,《新刻旁训故事四字经》的版式是上下两截版,正文与注文穿插,版式很整齐,但如果注释要增加,这样的版式必然容纳不了。杨臣净本《龙文鞭影》的版式是上截版四言句,下截版注文,由于注文文字多少不一,位置上往往和正文产生偏差,有时候甚至产生严重错位。李恩绶修订本则将杨臣净本的注释都修改到一定的长度,使每条掌故的注文都在四行左右,注文紧接于大字正文之后。李本和杨本的注释互有繁简,主要原因是李本更多考虑了版式的需求,即李恩绶《校补龙文鞭影凡例八则》中第一则:“此书原刻每篇隶事八条,惟小注不匀称,每溢至下半叶。兹增事稍多,而限以篇幅,俾阅者一目瞭然。”

三、《四字经》的变迁所反映的中日蒙学教育理念

综合上面两节所讨论的《四字经》在中日两国的变迁情况来看,《四字经》在日本江户时代曾多次被翻刻,并受到伊藤长胤、朝川鼎等著名日本汉学家的重视。本人所见日本流传的《四字经》,与正宏师访得的两种属于同一个

版本系统,都保留了萧良有原著的基本面貌。在中国,《四字经》则向着越来越繁的方向发展,成为了脍炙人口的《龙文鞭影》。《四字经》一书在中日两国的流传可以说走了相反的路径,反映出同属汉字文化圈的两国在近世的蒙学教育上的差异。

如果对比《龙文鞭影》杨臣诤、李恩绶序,和日本元文版《四字经》的伊藤长胤序,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中日学者在对《四字经》一书性质的理解,以及蒙学教育的理念都有很大不同。杨臣诤叙中说:

庚子春,惠影城西,朝来爽气恒惬心情,缘取曩书复为增订,迄秋尽而告竣,遂不止倍差于前。盖思以博学为先入,自不禁其幅之溢也。友人王子、陆子,与有同好,俱不辞擗管裹事,且怂恿余曰:“君家龙文,又加一鞭影矣。”因更名《龙文鞭影》,付诸剞劂,凡属驹齿未落者,皆当见鞭影而驰,以无负不佞较雠之苦志,斯可矣。

李恩绶序说:

明贤《龙文鞭影》一书,风行已久。童子入塾后,为父师者暇即课其记诵,盖喜其字句不棘口,注中隶事甚多也。

杨臣诤增订《四字经》,并更改书名为《龙文鞭影》的用意,都在于鞭策“驹齿未落”的儿童勤奋学习,令其在初学时即能尽量多地记忆历史掌故。李恩绶则道出了《龙文鞭影》一书风行的原因,即此书徵引掌故丰富,押韵的四言句又便于记诵,为家长和塾师提供了便利。实际上,蒙学书的畅销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家长和塾师的需求,而非儿童本人的意愿。

伊藤长胤序则说:

薰聒之移人,深于耳提;童习之成性,不待夏楚。今也舞勺之教久废,外传之训不修,批阅浮情,以及于长;而后始欲尚友古贤,以服圣训,宜其扞格之难禁也。欲端其蒙养,莫如使其日记故事,渐渍于前言往行,以成其性焉。《千文》、《蒙求》之作,其庶几乎!然泛资博闻,或疏规戒。明汉冲萧良有氏著《四字经》,括往牒之成语,存前世之法戒,协以韵语,以便课诵。幼学之徒读之,虽未必通其义,而谳其名号,亦发蒙之一助也。刻成丐序于长胤,因弁其端以数语云。

伊藤长胤认为,虽然《千字文》、《蒙求》等蒙学书籍在日本早就广为流传,但《四字经》的独特价值,就在于为儿童的历史教育和道德教育,提供一种简单易诵的读本。而本文第二节中已经提到,杨古度在叙中说,增订此书时“复益以安平李瀚《蒙求对偶》,及江右俞文彬《续集》”。两国学者对此书的想法可以说是截然相反。

萧良有撰写《四字经》的背景和意图,现在无从考证。但可以设想,以其学识和经验,完全可以撰写一部更加庞大的蒙学读物。所以《四字经》的撰写目的,大概就是为普通儿童的历史和道德教育提供一个最为基础,最易记诵的文本。伊藤长胤对此书的看法,大概是非常符合作者本意的。

正是由于两国学者蒙学教育理念的不同,以及具体社会环境的差异,《四字经》在中日两国流传时,面貌有了截然不同的不同。在日本,《四字经》从江户时代中期开始翻刻,一直都保持了原书的内容和形式。特别是江户后期出现的学古塾版,删去了注释并规范用字,兼具了历史蒙学书和识记汉字的功能,是日本汉学界和出版界对此书的创造性利用。此书畅销于日本江户时代的三大城市,收到了良好的市场效果。在中国,清朝人对《四字经》多次进行增补修订,成为卷帙几倍于原书的《龙文鞭影》。苏州的扫叶山房和南京的李光明状元阁等大书坊对《龙文鞭影》一版再版,在其内容和版式方面花了很多工夫,进入民国后还有众多的石印本出版,在中国的蒙学书籍中可谓是深入人心。伴随着《龙文鞭影》的盛行,《四字经》在中国渐渐淹没无闻,仅在安徽乡间尚有流传。

本文的写作,始于业师陈正宏教授借观所藏古籍珍本,在写作过程中,京都大学平田昌司教授曾惠予宝贵意见,在此谨向二位先生表示感谢。

作者单位:日本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